



# 民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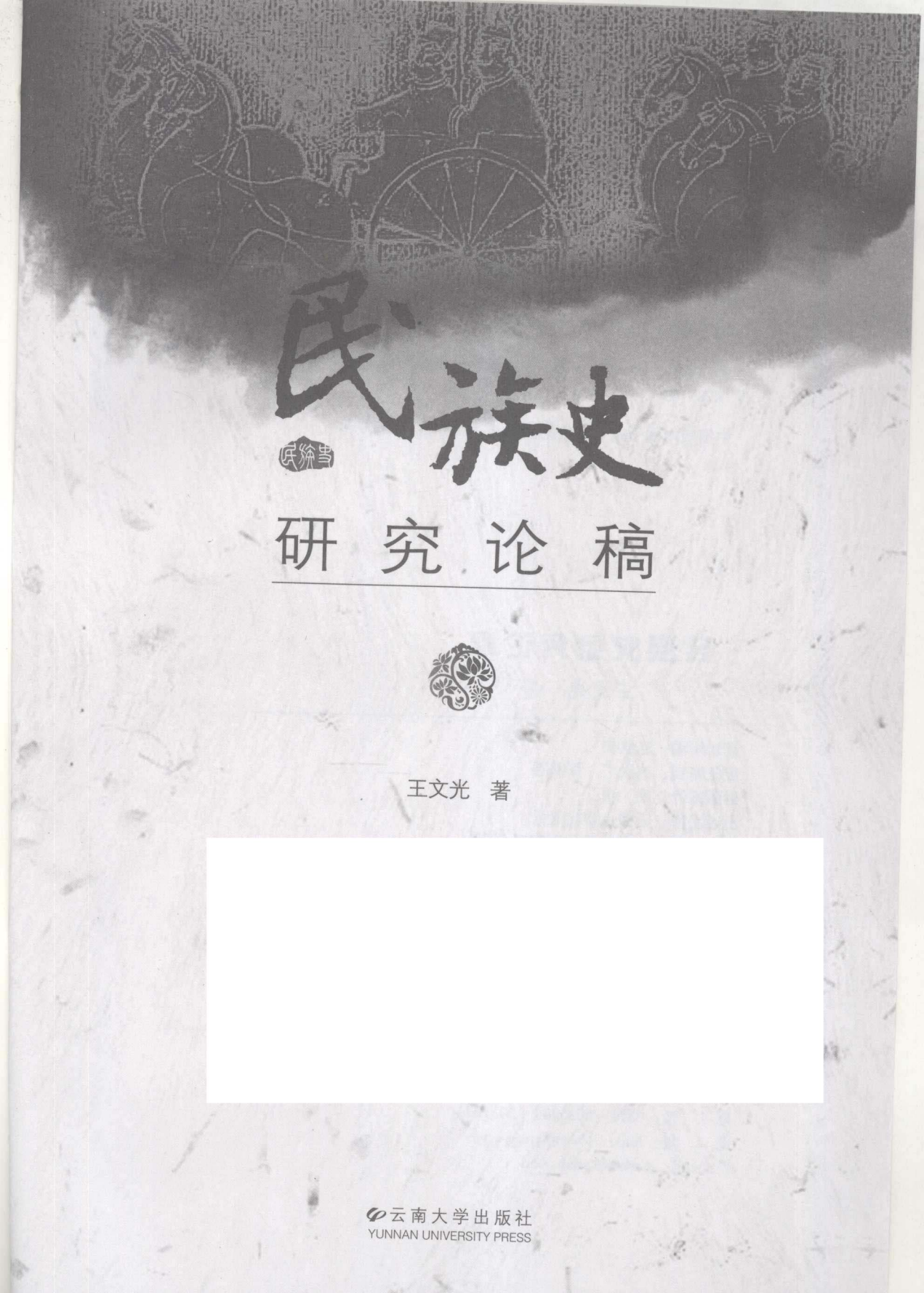
民族史

## 研究论稿

王文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民族史

民族史

## 研究论稿



王文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史研究论稿/王文光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1112 - 441 - 5

I. 民… II. 王… III. 中华民族—民族历史—文集  
IV. K2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660 号

## 民族史研究论稿

王文光 著

---

策划编辑: 赵红梅

责任编辑: 纳文汇 张秀芬

封面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28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441 - 5

定 价: 30.00 元

---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 目 录

### ※中国民族史宏观研究与民族史学研究

|                                  |      |
|----------------------------------|------|
| 中国民族史研究散论 .....                  | (3)  |
|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 | (9)  |
| “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 .....        | (21) |
|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互动述论 .....              | (32) |

### ※百越民族史研究

|                                   |      |
|-----------------------------------|------|
| 百越民族史整体研究述论 .....                 | (47) |
| 并非永恒的空间<br>——百越及其后裔地理分布动态研究 ..... | (58) |
| 先秦时期历史文献中的越民族群体 .....             | (66) |
|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                 | (7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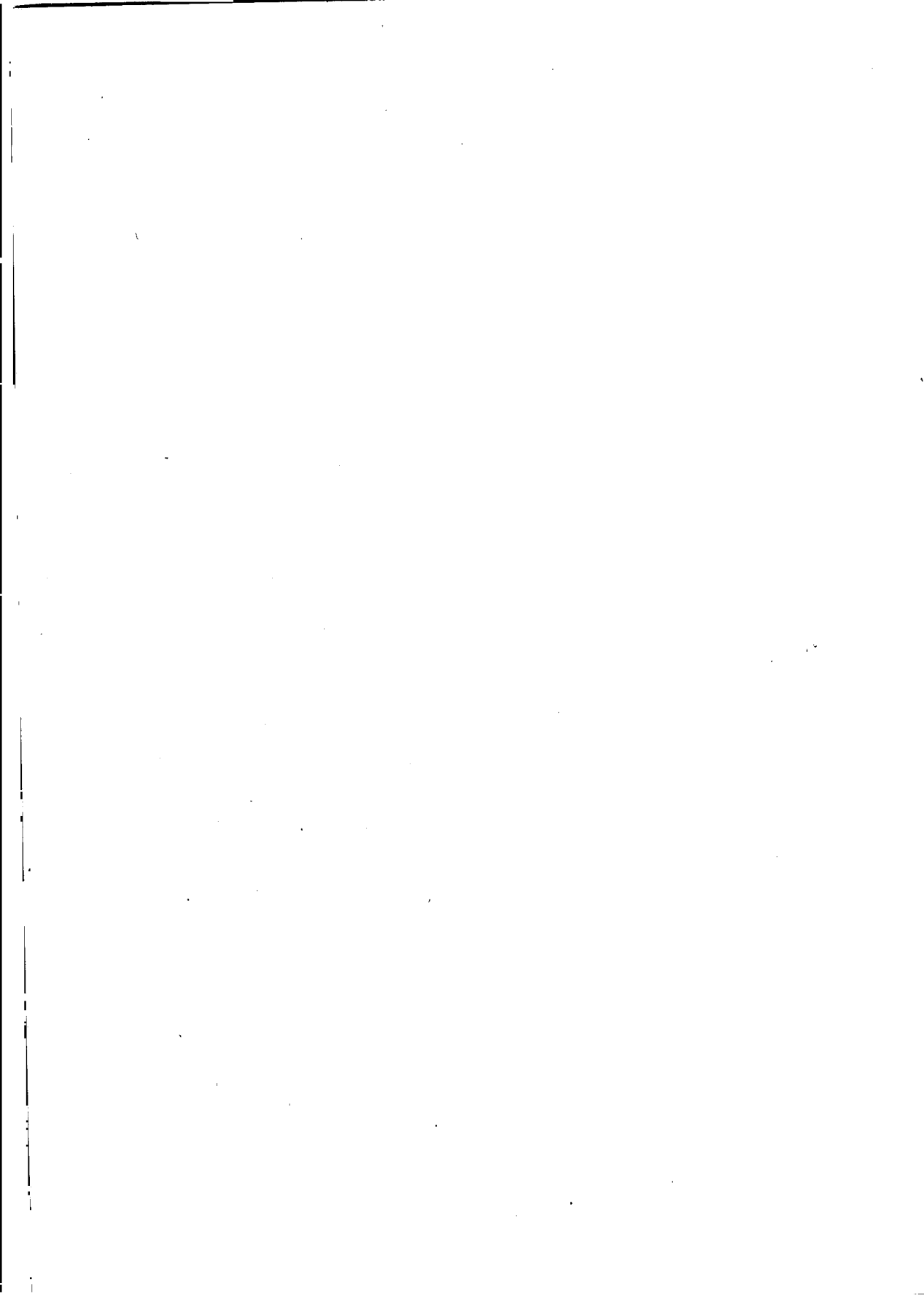
### ※民族源流探究

|                        |       |
|------------------------|-------|
| 掸傣民族源流问题述论 .....       | (89)  |
| 僚族源流考释 .....           | (99)  |
| 从同源走向异流的越南百越系民族 .....  | (109) |
| 越南京族、芒族的由来与发展之我见 ..... | (122) |
| 越南岱依、依族源流考 .....       | (128) |
| 昆明族源流考释 .....          | (134) |
| 西南边疆乌蛮源流考释 .....       | (143) |

## ※以西南民族史为中心的研究

|                                |       |
|--------------------------------|-------|
|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161) |
|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 .....             | (176) |
|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之二 .....           | (184) |
| 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述论 ..... | (193) |
| 试论中国西南民族青铜文化的地位 .....          | (208) |
| 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札记 .....         | (220) |
| 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及其民族关系 .....          | (225) |
| 大理国的乌蛮 .....                   | (235) |
| 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 .....        | (244) |
| 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研究论纲 .....             | (256) |
| 后 记 .....                      | (271) |

# **中国民族史宏观研究与 民族史学研究**



## 中国民族史研究散论

公元前 21 世纪，炎黄族群中的夏族建立了夏王朝，紧接其后的商族、周族亦分别建立了具有发达文明的商朝和周朝，这表明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的各地区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迅速发展，在地区内渐渐实现了一种内部的平衡与稳定，然而，在他们的东西南北仍存在着许多生产方式各异、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人们共同体。基于这一现实，出现了华夷五方的民族观，这是华夏族以及后来的汉民族用自己的价值观所进行的判断，即以自身为核心再向东、南、西、北四周进行辐射式的划分和描述，这显然是以我为中心、周围四方都是蛮夷的观念。虽然这在表面上体现了以我划界的傲慢与偏见，而其根本上反映出的却是与中原农耕方式相联系的祖先血亲崇拜及其所产生的某种自信心和排他性。此外，由这一地区向四周纵深扩展出去，遇到的不是浩浩茫茫的海域（东边）就是雪域（西边），要不就是差异很大的草原（北边）和山区（南边、西南边），因此，在相对稳定、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眼中，四方皆荒的观念的产生似乎便有其道理了。<sup>①</sup> 由此也就产生了“中华”、“中国”等观念。

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和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吴人、越人、楚人，以及西南地区较为发达的蜀人、巴人的大部分，在长时期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上、军事上的矛盾冲突中，在先后合并的基础上逐渐地完成了民族间的融合、政治上的统一，到秦始皇时得到进一步强化。汉民族便在这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形成，并发挥着主体民族的凝聚作用，带动着兄弟民族的发展，维护和加强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融合性。即汉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的融合史，这种融合早在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发展过程中就已存在。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

<sup>①</sup>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总序》，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 页。

都范围的考证,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这是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传说中黄帝是最早的祖先,黄帝之后相继以禅让方式成为大部落首领的尧、舜、禹,虽然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子孙,然而历史传说又表明汉族的远古先民,实际上也融合了包括羌、夷、三苗、黎等人们共同体,史书中才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记载。《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高诱注曰:“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sup>①</sup>另外,《帝王世纪》又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其先出颛顼。颛顼生鲧,尧封为崇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见流星贯昴,楚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禹)长于西羌,西夷人也。”注引譙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sup>②</sup>还有一些传说的人物,按不同记述,可解释为羌、夷、苗。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人们共同体逐步融合的历史过程。

夏、商、周时期这种融合更为明显,夏族为大禹之后,商为东夷,周人则自称为夏人的一支,杂居于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他们虽都自认黄帝是祖先,而实际上却是来自不同部落集团的人们共同体。他们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河流下至河济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颍上游生活,继而发展至淮河、泗水、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最终融合而形成共同族体,到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与蛮、夷、戎、狄相区别。<sup>③</sup>华夏族从一开始时就是一个异源同流融合而成的民族,而且这一基本态势在后来的汉民族发展史上也是以异源同流的融合史作为汉民族发展的主旋律。

秦汉以后,随着民族间各种交往方式的增加,在多数情况下,由于汉民族的经济文化居主导地位,便作为一个主体不断吸纳、融合众多的民族。从宏观上来看,汉族更多地吸收融合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北方的南匈奴、鲜卑、羯、氏、契丹、党项等民族的绝大部分都被汉族融合了。因此,到今天为止,虽然同是汉族,但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却有着一些遗传学的差别。<sup>④</sup>这就充分说明了历

① 《孟子·离娄下》,高诱注《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317页。

② 《帝王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④ 杜若甫,肖春杰:《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史上北方民族大量融入汉族的事实。反之,汉民族也正是在这种融合中更加壮大,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是扩展性。即汉民族的分布区域由中原向四方扩展,这在客观上又加速了汉民族的融合速度(当然,与之相伴的是,也有部分汉民族成员融入非汉民族中去)。历史上汉族人口有过几次大规模自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向长江、珠江流域南移。“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口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经南北朝,继续有汉族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南方汉族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鄱阳、太湖等大湖周围和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秦汉到清朝,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口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居。汉族经历了与中国境内各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共处、迁徙,最终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在边疆与当地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三是南北民族的差异性。杜若甫、肖春杰两先生从遗传学的角度,充分论证了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差异性。他们认为:北方的汉族为北方蒙古人种,而南方的汉族却属于南方蒙古人种,这主要是汉族大量吸收少数民族的结果,各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在血缘上逐渐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便可充分说明问题。<sup>①</sup>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由于各民族发展力量的变化,中国各民族内部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各民族之间和民族群体内部为了重新寻求平衡与稳定,便表现为急剧的分化与重新组合的运动状态。从表面上看,国家统一的格局因为民族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而被破坏,但从民族发展的实质性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整个中国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民族融合的快速发展阶段。

## 二

多年来,在对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常常忽略了对汉族的研究,似乎中国历史就可以代替汉民族历史,因而民族史就等于“少数民族史”,这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对此,诸多学界前辈深有感触,费孝通先生认为:“少数民族的社会不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与汉族的

<sup>①</sup> 杜若甫,肖春杰:《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关系，希望今后做民族研究的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sup>①</sup>

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存在了几千年，但许多研究者一提到民族研究，往往理解为“民族”只指少数民族，而不包括汉族在内，他们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不少学科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研究汉族，因此民族研究中就不用专门进行汉族研究。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实际上，任何一部中国通史都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汉族历史。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汉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是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并在血缘上、文化上融为一体的结果。因此，全面系统地探讨汉民族的历史，必然会促进各民族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从而加强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理解。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汉族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控制中央政权，加上其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大汉族主义的倾向，把汉民族历史表现为或等同为中国史，这种观点实际上模糊了汉民族研究的界限，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等同于汉民族的研究。

### 三

人类凭依独具的精神活动使自己高居于生物之上而成为万物之灵，但其生存和发展与其产生一样，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环境。一方面，人类必须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必须以一定的地域环境为依托。一部人类发展史，除了以一定的时空作为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外，生产实践——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重要的内容。不同的自然环境，使生活于该环境的人类必须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又使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表现出不同的特点。<sup>②</sup>

从历史上来看，整个中国北方、南方在地理因素的制约下，不同的人群很早就开始产生差异，并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童恩正先生曾说：“在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里，不同的人类集团居住在如此不同的生态条件之中，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然会表现出显著的差

① 费孝通：《盘村瑶族·序》，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② 李瑞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异。”<sup>①</sup>从时间上看,旧石器时代南北就在生产方式、人种类型上产生了差异,“处在旧石器时代的黄肤色人们大多过着以渔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北方半干旱地区渔猎生活持续得更长久。南方湿润气候中的人们从事采集业出现相对较晚,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黄种人开始分化为南北两个类型”<sup>②</sup>。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东亚相对封闭环境中发展的人类集团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便可分为北方的游牧经济类型和南方的农耕经济类型,也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发展中的融合特点、关系特点等。

从宏观的角度看,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一直是在和平与暴力的交互式交往中发展的。游牧文明需要农耕文明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农耕文明则需要游牧文明的马匹和皮革,这使双方通过和平互市来满足各自的需要。但在一定时期,游牧民族也以武力的方式进入农耕文明区;反之,农耕民族为了开边拓土,也有以武力略取游牧民族土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游牧文明的各民族具有军事优势,一旦他们进入农耕地区,这种优势就在其自身农耕化和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消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农为本的农耕经济,在长期与游牧经济的矛盾运动中,显示出了优越性和坚韧性。

早期中国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地理分界线应为长城,这是农耕民族用来抵御游牧民族的防线。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当人口增长便又要新开垦荒地,使分布区日益扩大。而游牧经济则反之,牲口靠在地面上自然生长的草得到食物,牲畜在草地上移动,游牧民族靠牲畜获得皮、毛、肉、乳等生活资料。游牧民族以马匹作为行动的工具,其行动迅速,集散容易,一旦遇到灾荒,游牧民族便会南下就食农业区。当双方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两种经济类型的矛盾便立即尖锐起来。对于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个体小农是无法抗拒的,于是不能不依附于可以保卫他们的武力,以及可以动员和组织集体力量来建筑防御工程的权力。这也是促成中央集权政体的一个历史因素。<sup>③</sup>

在上述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南北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北方民族关系多以征战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南方民族关系则多以谦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仍然还是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经济类型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特点。由于游牧民

①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

② 安京:《试论中国古代民族的产生与区域》,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5期。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族在军事上占了机动性强的优势，所以，一旦中原汉族统治力量削弱之时，他们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中原汉族政权。但是，由于历史的不可逆转性，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任何一个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民族总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整合力的，所以，尽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定居后，开始都认为游牧优于农耕，但曾几何时，他们均被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所融合。而南方的汉族、少数民族多为农耕经济类型，相互间在经济类型上的一致性，自然产生一种认同感。又由于汉族先进的经济使汉文化对南方少数民族产生一种吸引力，于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便多以和的形式存在。

（原载《思想战线》2000年第4期）

##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19世纪至20世纪相交的前后10年中,中国经历了甲午海战惨败、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烧掠北京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明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对这种历史变化,梁启超从民族的角度有过这样的描写:“(中国民族)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催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sup>①</sup>梁启超在这儿讲的“过渡之道”即民族的危亡时刻,是中国民族发展的又一个历史转折点。

在民族危机、边疆危机的社会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民族史研究,目的在于激活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激发爱国精神。1901年,梁启超在《清义报》第90、91册上撰文阐发中国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1902年在《新民》杂志第2至4号上发表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鼓吹在民族竞争的大势下,中国民族必须奋起,鼓起民族主义的精神,去争夺地球上的地位;1903年,在《新民》杂志第32号,发表了论文《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民族的基本概念,解读了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必须要具备的基本条件;1905年在《新民》杂志第65、66号上发表了论文《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文中讨论了民族源流问题、民族关系问题。至此,梁启超的民族史学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等已基本确立。

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已构建起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并在大学讲坛上发表他自己对中国民族史学科中中国古代民族的族属源流、语言系属、分布变化等见解。梁启超的博识宏论,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1923年4月在《史地丛刊》上连续两期发表了他在清华等大学的演讲稿,题为《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篇2万余字的论文,可以看做是最早的一部中国民族史讲授纲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是相当深入且超

<sup>①</sup>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页。

过他以前的学者，中国民族史学科从此走上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之路。

—

作为一位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史时，对民族的定义概念格外关注。梁启超认为伯伦知理以前的学者往往把民族和国家相混，所以伯伦知理才给民族下了定义，认为“民族者，民俗沿革所发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则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处一地。此言其朔耳）。（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三）同其支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sup>①</sup>对此，梁启超认为：“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间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谓之民族。”<sup>②</sup>对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要素，梁启超特别强调语言、风俗，民族性，即“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sup>③</sup>因此，梁启超认为即使是同源尧祖的民族群体，当迁居到遥远之地，与母国民族长久分离，必然在语言、风俗、宗教上产生变异，这时可能已经成为另一个单一民族了。他说：“北国之先（指北方的少数民族），其所自出，可不得考，史家或以为亦神祖黄帝之支裔。虽然，既窜于异域，与母国殊其语言，殊其风俗、殊其宗教，则已不得谓之为一民族。”<sup>④</sup>显然，梁启超认为语言、风俗、宗教应该是民族识别的重要因素。

随着梁启超对民族及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形成了比较系统，且符合中国民族形成发展历史与现实的民族概念。梁启超认为在民族概念诸要素中，民族意识最为重要，他说：“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sup>⑤</sup>梁启超将民族意识总结为“对他而自觉为我”是十分准确的。

①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②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③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④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4页。

⑤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页。在梁启超早期的行文里“中华民族”常常是专指汉族，这是必须注意的。

此外,梁启超还从中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进一步论述民族意识,他认为春秋时楚国人说:“我,蛮夷也。”说明当时楚人还是具有独立民族意识的民族群体,而到了战国时已融入华夏,丧失了楚人的民族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接着梁启超又举例:“南越王佗自称‘蛮夷大长’,此即汉武帝时,广东人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及魏晋以后,粤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满洲人初建清社,字我辈曰汉人,而自称旗人,至今日则不复有此称谓,有此观念,故凡满洲人,今皆为中华民族之一员。反之,如蒙古人,虽元亡迄今数百年,彼辈犹自觉为蒙古人,而我为汉人,故蒙古人始终未尝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sup>①</sup>梁启超所谓的民族意识,也称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它是在民族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历史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民族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有些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发生了变化,但只要民族意识存在,民族就依然存在。因此,百年以前梁启超就有如此的学术思想,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除对民族概念进行深入的阐述外,梁启超还对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的关系及其异同作了分析,他认为民族与种族是不能等同的,“种族作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一种族可析为无数民族,例如条顿种族析为英、德等民族,斯拉夫种族析为俄、塞等民族。一民族可含无数种族,例如中华民族含有羌种族、狄种族,日本民族中会有中国种族、倭奴种族”<sup>②</sup>。尽管梁启超在使用“种族”这一概念时与今天所指有差异,甚至是不太准确的,但他对民族与种族的区别思想却是十分正确的。

对于民族与国民的区别,梁启超认为国民是法律学的研究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一个民族可析为两个以上之国民,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sup>③</sup>。

## 二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研究对象为从古至今已经消失和还存在的民族及其发展历史,这是没有疑义的。但这些民族如何分类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梁启超的民族分类值得重视,其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①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页。

②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页。

③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页。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九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八个派系为苗蛮族、蜀族、巴氏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sup>①</sup>。

到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对中国民族的派系划分又有了新的看法，他将中国民族分为八组：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氏羌组、群狄组、群貊组。各组之下又包含一些民族，因此，梁启超的“组”相当于“族系”的意思。现评析如下：<sup>②</sup>

诸夏组，诸夏组最早的核心是神话时代许多文化相近的部落，到舜、禹时，民族意识确立，开始有联邦的结合。从夏、商到战国时期，华族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广泛吸收周边民族，分布区则“除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中国本部，皆为诸夏范围矣”。

东夷组，东夷在古代又有九夷的称呼，所以东夷实际上含有众多民族。梁启超认为东夷在春秋前后最著名的民族有莱夷、淮夷、徐戎（按，显然梁启超把他早期的徐淮组又重新分为东夷组，徐、淮二夷包含于其中）。莱夷分布在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青州，在战国时融入华夏族；淮夷历史较为悠久，在《书·禹贡》《书·费誓》《诗·江汉》中有记载，汉朝以后融入汉族。所以，东夷组的民族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荆吴组，梁启超的荆族实指楚族，而吴指春秋的吴国之民，对楚与吴是否是同一族系，梁启超也仍然拿不准，他认为：“吴俗断发文身，其族系与楚较近，尚难断定。”实际上吴族即越系民族之一，春秋以后与楚族一同融入华夏族。

苗蛮组，对苗蛮组梁启超说：“苗、蛮族种类甚多，今在滇、黔、桂诸省者，细别不下数十族，今学者研究之结果，区为三大系，曰苗，曰摆夷，曰傈僳。”对苗蛮组的分类梁启超大约主要是着眼于分布区域，因为苗、摆夷（今傣族）、傈僳（今彝族）主要分布在西南，但族属类别上是有区别的，他们分别属于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的民族。关于苗蛮组的民族融合问题，梁启超有一个看法是十分正确的，即认为汉民族中融合了大量的苗蛮民族。

百越组，梁启超认为百越组其内部也是种类繁多，有越、瓯越、闽越、南

① 《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5页。

②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7~3229页的内容，故不再一一作注。